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中国古典诗歌 变革的困境

——黄遵宪诗歌研究

ZHONGGUO GUDIAN SHIGE BIANGE DE KUNJING

杨站军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文库



中国古典诗歌变革的困境

——黄遵宪诗歌研究

杨站军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典诗歌变革的困境:黄遵宪诗歌研究/杨站军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6
ISBN 978-7-215-06934-3

I. 中… II. 杨… III. 黄遵宪—诗歌—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0178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5.875

字数 140 千字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6.00 元

绪 言

传统与现代是常为人们津津乐道却又争论不休的话题,各家各派、各方议论各执一端,这一方面极大丰富和深化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凸显出中国文化在面临中西古今文化冲突交融时所遭遇到的许多尴尬与发展困境。历史是一种被时间尘封了的过去的客观存在,它缄默不语,却凝聚着不朽的精神智慧。令人深思的是,在当今这个前所未有的开放环境中,人们可以以足够的宽容与同情的心态,来看待形形色色的外来文明与思潮,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价。长期以来,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甚至被看做是封建余孽的主要来源。然而,在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之下,在中西之间交流更加深入的时代潮流之下,探讨近代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后所面临的发展困境,对中国文化的发展仍有重大的指导和启发意义。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就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认为,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的潮流。回顾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国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开始走上全球化的道路。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并非始于这一时期。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历程,正是中国文化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体诗歌的演变历程,其实就是中国人接受外来文化与挣脱传统思想禁锢的过程。中国近代社会的急剧变化,使得诗人的诗歌创作有了前进的动力,也使得诗人与社会联系得更加紧密,诗人用诗歌创作来表达真实感情与新的社会现实,从而使得他们的诗歌形成了一种新的诗歌风尚,体现出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艺术风格。

黄遵宪不仅是晚清时期一位杰出的外交家、维新派启蒙思想家和政治改革家,更是一位杰出的诗人。黄遵宪本人并不以诗人自命,“馀事作诗人”,其理想抱负在于用世,然而晚清并没有提供给他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却成就了他成为诗人的事实。晚清时期,中国面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学也面临这样的历史契机,作为这一时期一个主要的文学现象,黄遵宪的诗歌理论与创作活动代表了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而他的文学活动在变革面前所遭遇的矛盾与困境,也是晚清时期诗人的共同境遇。本文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对黄遵宪诗歌活动的考察,探讨传统知识分子在新旧交替之际面临的变革,以及他们的文化与精神困境,进而反思中国文化的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艰难。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轨迹	1
一、中国古典文学在近代的转型	1
二、中国诗歌在近代的变革轨迹	10
第二章 黄遵宪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21
一、“我是东西南北人”——黄遵宪的经历及创作	22
二、“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黄遵宪的诗歌主张	29
三、“上感国变，中伤种族，下哀生民” ——黄遵宪的诗歌创作及风格	51
第三章 黄遵宪与近代其他诗人	69
一、黄遵宪与诗界革命	69
二、黄遵宪与同光体诗人的交游	100
三、黄遵宪与南社诗人比较论	106
第四章 近代文学变革的两难困境	111
一、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111
二、艰难的文化选择	117
三、反思中国古典诗歌的变革	144

结 语 说不尽的黄遵宪: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黄遵宪	161
参考文献	177
后 记	183

第一章

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轨迹

一、中国古典文学在近代的转型

1. 近代文化的转型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而导致传统文化发生转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其内部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的文化结构失衡;另一方面是外部因素,就是传统文化遇到外来文化的渗透或挑战。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深重、社会动荡和社会变革剧烈的时代,反映在文化方面,中国经历了一个从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艰难过程。

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发生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政治落伍且极其腐败,弄得国弱民穷,因此,西方文化表现出强势作用。中国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傲视、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滋生出钦羨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两种偏向长期存在,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困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激烈地攻击和否定传统,一方面是美化和迷醉传统。这种情况除了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之外,不能不说也同人们未能充分理性地认识近代文化转型的客观趋势及其意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社会已经开始由鼎盛走向衰亡,社会危机加重,整个社会“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①,社会正处在变革的前夜。这时,以儒学为主流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结构更加明显地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桎梏,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西方早在14世纪起就开始了伟大的文艺复兴,文艺复兴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在人文主义的倡导下,开启了工业革命,变革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变革主要是通过启蒙达到思想解放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实现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到了19世纪40年代,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受到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西方通过鸦片贸易打破清政府封闭的经济体系,进而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逐渐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开始动摇,中国人也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开始由被动到主动向西方学习,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由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

近代文化的转型,正像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中国近代文明的演变历程时所说的“三期”：“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第二期所经过时间,比较的很长——从甲午战役到民国六、七年间止……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渐渐有点废然知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时期了。”^②在这里,梁启超把中国近代文化演变归结为三个重要的方面:器物、制度、文化。

①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载于《最近五十年——〈申报〉馆五十周年纪念》,1922年2月版。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第一次震撼了中华帝国,列强用坚船利炮冲开了清政府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中国也被纳入近代化的艰难历程,中国文化也面临从古代向现代的过渡和转型。沉睡已久的封建帝国中,一部分人开始醒来,看到了中西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后,国势衰落已呈显相,魏源针对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这比起明代后期徐光启等人提出的“会通中西”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它打破了传统的“天朝上国”观念和华夷之辨,真正举起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大旗。

鸦片战争爆发以后,戊戌变法之前,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近代中国“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型不可或缺的一环。洪秀全一方面把“武器的批判”对准清王朝统治者,另一方面把“批判的武器”直接指向孔子和儒学。太平军所到之处,孔庙付之一炬,孔子本人也被宣布为“妖魔”,“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①,洪秀全以“皇上帝”的名义命令将孔丘捉拿归案,明确地把孔子和儒家学说作为革命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史无前例的,所以曾国藩在《讨粤匪檄文》中首列洪秀全的反孔罪名以衬托湘军为正义之师,写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②尽管洪秀全在意识形态上宣布与儒学势不两立,但作为一名自幼读孔孟出身的书生,儒学仍然浸透在他的思想和潜意识中。洪秀全把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和空想主义与儒家大同思想结合起来,所谓“太平天国”一词,就是这种奇异的中西结合的产儿——“天国”是基督教的,属于西方文化的范畴;“太平”是儒学的,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

① 洪秀全:《太平天日》,转引自侯外庐《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76页。

② 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世界书局1936年版,第148页。

正是“太平天国”这个中西文化的杂交体，掀起了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高潮。洪秀全的社会主义思想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融会的第一个思想成果。

然而，到了18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中国遭到了更为沉重的打击和失败，严峻的形势使更多的中国人得以觉醒，他们明显地意识到，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强大敌人的挑战，于是，提出引进西方近代军事、科技的人士显著增加。在这样的情势下，不同出身、不同地位的人们，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共识下聚集起来，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洋务派。他们在中央以奕訢、桂良、文祥等权贵为代表，在地方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还拥有一大批为革新著书立说、大造舆论的知识分子，以及一批渴望采用西方的先进生产技术的民间工商界人士。当此时，太平天国运动业已渐趋平息，洋务派利用国内外暂时的和平环境这一有利时机，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化军事工业，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洋务运动。这些人士的思想和行动，正是基于对于国家和民族具有深刻的危机感和责任感。奕訢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上奏说：“庚申之衅，创巨痛深”，“城下之盟，春秋所耻”。他希望能够接受教训，“力图自强，以为御侮之计”。李鸿章也指出，洋人“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未有之强敌^①”。因而，洋务派一致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富国强兵，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机。他们首先认识到，以机器生产为核心的近代工业革命是富国强兵的根本。

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民用工业和新式交通运输业也发展起来了。洋务派认识到，强大的国防基础在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要求能源、钢铁等工业与之配套。同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也必须发展民族经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轮船招商局、矿务局、电报局等相继出现。

① 李鸿章：《筹画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7，第17页。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但中国的近代化,以及它为了自身安全所作的努力,阻止或延缓了殖民地化的进程,不断地提高了中国与列强较量的水平与能力。同时,洋务运动也使国人广开眼界,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是中国第一次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经济改革运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30多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出现了火车轮船、电报电话、机器电力、高楼大厦,一个末世王朝在经济上开始了向现代化过渡,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的面貌。

最为关键的是,洋务运动在中国文化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从洋务运动的客观效果看,它体现出的文化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生产方式的序幕,初步奠定了近代文化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具有近代性质的大机器工业,产业分布比较齐全,有冶金、机械、煤炭、矿产、军工、纺织等等,实际上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业构架。第二,洋务运动传播近代科技知识,培养近代中国第一批科技人才。它促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诞生,不仅新式学堂遍及各地,而且开始了大规模的出国留学教育,从中产生出杰出科技人才詹天佑、优秀军事将领邓世昌等人。从此以后,中国古代的士人逐渐转变为近代的知识分子,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出现并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三,洋务运动促成社会风气的转变。学西夷之长,兴洋务之业,日渐称为社会的共识。同时,中国传统的贵义贱利、重农轻商的观念开始发生动摇,标志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近代工商业开始在中国兴盛和发展起来。第四,它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反响,使国人对于中西文化之间关系的认识更深了一步。洋务运动的推行,在朝野上下引起强烈反响。守旧派与洋务派论争不断,逐渐成为舆论的中心。在全社会范围内,洋务运动全面引入西学、西艺造成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也引起有识之士更深一层的思索。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人对中西文化

相互关系的深入思考,具有积极意义。这些都为甲午战后中国近代文化的真正出现提供了基础。

1894年,甲午战败,泱泱大国的清政府输给一个历来不受重视的小国日本,成为中国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主权沦丧,这样就更加便利了西方列强加大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瓜分狂潮,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中国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从政治方面师法西方,于是开始了政治维新的变法运动。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维新变法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文化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当中,可以说,迈出了最为关键的一步。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近年来,很多研究者在探讨中国文化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源头时,都自然地目光聚焦于晚清尤其是维新变法时期。

中国文化正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发生了剧烈的转变,中国文化开始了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魏源率先提出“师夷长技”,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更是提出“中体西用”的口号,以为西方文化的优长在于船坚炮利。但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有识之士开始越过器物层面去探究国体衰弱与政体腐败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期间,严复接连三地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鼓吹维新变法,即把中国与西方的主要差异归结为政治制度的差异。同时,当时的文化精英们也都认为,只有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才是中国的自救之道,于是,便有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的变法改良运动。继戊戌变法之后,辛亥革命也是从政治体制上师法西方,希望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同样是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中西文化冲突开始深入到文

化心态层面,而五四文化精英们逐渐认识到,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学理探讨,必须上升到哲学层面,才可能求得心灵的最后觉悟,这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

2. 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

伴随着这一文化转型,中国文学也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经历了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转变。关于中国文学的转型,朱德发曾经指出,“所谓型者,样式也”;所谓中国文学的转型,从字面上说,就是文学样式的转型,中国文学的转型即中国文学样态的转变。

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包括近代作家的文学观念、表现内容和艺术特征这三个因素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①。

胡适认为,文学样式的每一次变化就是一次革命,他指出:“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二大革命也。赋变而为无韵之骈文,古诗变而为律诗,三大革命也。诗之变而为词,四大革命也。词之变而为曲,为剧本,五大革命也。”^②在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韵文在样式或形态上发生的这五次大的转换,标志着诗、词、歌、赋等文体日臻完善与定型,但这些转型,不仅不是现代样式的转型,而且及至明清之际已走上复古或拟古之途。这样来考察和解释中国文学转型是符合韵文样式的承传与转变轨迹的,并且不能完全认为这种说法是形式主义的;如果遵照这种标准与思路来分析中国文学向现代转型,那无疑是五四文学革命了。然而在现代文学到来之前,近代文学的转变,可以说为现代文学的到来,即为中国文学的真正转型开辟了道路,正如王德威所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③因为只有经过五四文学革命的冲击与洗礼,中国文学形态才真正发生了全局性的变化,不仅各种文学样式来了个大换装,结构、形体焕然一新,与域外

① 李金涛:《中国近代诗歌转型论纲》,《江汉论坛》2000年第9期。

② 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载《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第一期,1934年。

③ 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导言》,《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的现代型文学有机地自觉地对接,而且在中国文学已形成的诗文为大道、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艺术格局中,也有了一定的变化和发展,尤其是戊戌政变以后,梁启超等人的“小说界革命”的提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的文学格局从此被打破,小说地位逐渐上升,改变了诗文长期霸占文坛的局面,小说从此也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使得中国文学的真正转型迈出了历史性、关键性的一步。

纵观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首先,体现在人们的文学观念的转换上。在中国传统文学观念中,主要是以儒家礼教为中心的“载道”的文学观,它认为文学是内心思想意志的表达,是用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用来“事父”、“事君”的。“载道”观虽然也不排斥言情,但这种情却必须受儒家“礼义”的约束,即“发乎情,止乎礼仪”^①,在“情”与“礼”中达到一种“温柔敦厚”的境界。在古代诗歌的发展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格调”、“肌理”、“神韵”等诸种诗学主张,但主要还是在传统的诗学观念下的演绎,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和发展。到了近代,一些主张革新的文学家,正是从这一点上着手突破,实现中国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等诗人更是打出以“尊情”为核心的诗学主张,最先撕开了“载道”观的封建性画皮,让现实的社会和人生开始与诗歌发生深刻的联系。黄遵宪则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的主张,提倡“新派诗”的创作。维新变法运动时期,维新诗派以“三长具备”、“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等诗歌主张,让新的时代内容昂首步入了诗歌神圣的殿堂,开始对“载道”观的核心内容予以置换,使中国诗歌出现了生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家进一步发展了维新派作家重视文学的政治教育功能的观念,使文学由传统的“载道”工具,变为了“新民救国”的利器,较为彻底地置换了文学创作为封建礼教与政治服务的实质内容。与此同时,接受了西方美学思想和哲学观念的王国维,则着手纠正维新派以来的文学家过分强

① 引自《毛诗大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调文学功利性的做法,提出了“超功利”的文学主张,第一次把中国文学从传统“载道”观的束缚下彻底解放了出来,恢复了诗歌的本体地位。

其次,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反映在文学表现内容的革新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了末期,同时西方列强用先进的军事科技打破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局面,救亡图存自然就成为这一时期文学表现的主要内容。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入侵,揭露并推翻封建王朝的反动腐朽统治,介绍西方新知新学,输入西方民主思想,培养国民人的意识的觉醒成为近代文学的核心内容。爱国主义是任何国家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剂和驱动力,是国之魂、民族之魂。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爱国主义一直是我们民族发展的主动力,但爱国主义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以讴歌汉民族抵御四周少数民族的侵略为主要内容的,它既爱国又爱民族也爱君王和封建朝廷,带有相当的狭隘性。进入近代后,“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它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它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由此使近代爱国主义的内涵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爱国诗派的笔下,民族意识开始觉醒,形成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齐心反帝的热潮,并开始出现反清倾向,忠君意识也有所淡化。在维新派的笔下,救亡图存的呼声高涨,形成变法自强的社会主潮,反对列强瓜分的热情也日益强烈,反清意识渐浓,当时代把救亡图存的重担压在近代诗人肩上时,也使他们的文学创作相应地有了一种崭新的启蒙新民内容。

再次,近代文学的转型,还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转变方面。在近代诗歌中,由于文学语言的变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逐渐发展并最终形成了一种取自当下生活或取自西方的“自造意象”,其内部结构变为“以意驭象”,组合方式也变为转喻式和描摹式。这些新意象的出现,一扫传统“原始意象”的陈腐僵化之气,使中国诗歌意象具有了新的文化内涵

和新的审美特征。在其诗歌中首先使用了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使其语言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具有了清新、自然、富有生命力的特点,在“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与此同时,他们也走“俗化”的道路,大量采用民间语言入诗,使其语言具有明白、通俗、活泼的特征。在形式上,近代诗歌的变化大致走过了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改造旧律诗的形式,从爱国诗派对“真情”的表达引起形式的新变化,到维新诗派以新名词新术语入诗,松动律诗形式规则的要求,再到革命诗派创作较为明白自由的政治鼓动诗;另一条是从通过吸收民间诗歌的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较为自由活泼的“杂歌谣体”,到大量吸收了西方诗歌营养,创造出了一种形式十分自由活泼的歌体诗。

从古典诗歌最为没落的鸦片战争前夕,到胡适“白话诗八首”发表于1917年2月的《新青年》,是中国诗歌由使用典雅文言、有着严格形式规定和传统美学规范要求的古典诗歌,转变为初步采用白话、不重格律、形式自由,有着新的审美规范的现代新诗的时期。在这一较为漫长的时期,中国诗歌走过了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而“前五四”则是这一历程中最为重要与关键的时期。

中国近代文学的转型,既是在特定的中国人文历史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又是在世界文学的总格局中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近代转型,由传统形态转到现代形态,既是在外国文学的影响下,与世界文学逐渐接轨,汇入世界文学的潮流,又继承着传统文学的血脉,显示出中国诗歌独有的民族特色,沿着近代化与民族化方向发展,成为世界近代文学总格局中独具特色的一脉,因此,中国诗歌的近代转型具有着重要的划时代的意义。

二、中国诗歌在近代的变革轨迹

有位哲人这样说过:“如果我们用历史的镜子去观察,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现在的经验。当我们以我们的时代的眼光来看待历史时,历史将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当过去与现在相互辉映时,我们的